

NEWSXIEZUO
ZONGHENGTA

新闻写作纵横谈

林 帆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

第三十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新闻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封面设计：陈长敏

责任编辑：阎焕书

G219.2-53
Z SX

415931-
40

2207

新闻研究资料

第三十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000字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363·045

定价：1.10元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1400号

目 录

·回 忆 录·

早岁那知世事艰

——记在成都《华西晚报》的经历黎 澍(1)

白头记者话当年

——重庆《新华日报》及其他夏 衍(21)

关于《新蜀报》的回忆萨空了(44)

报社是我们的新闻函授学校

——延安《解放日报》对业余通讯员的热情

指导午 人(48)

记桂林《救亡日报》林 林(55)

《救亡日报》老同志忆旧杂谈吴颂平(66)

·新闻界人物·

和人民同休戚，共命运

——从《燕山夜话》学习邓拓同志的办报

思想成美 顾行(72)

·新华日报研究·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的宣传艺术杨润时(88)

《新华日报》通讯的特色王美芝(108)

·新闻业史·史料·

- 新华通讯社发展史略(三)刘云莱(118)
抗战时期在广西出版的报纸彭继良(139)
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马光仁(156)
“人识华西有烛龙”李畅培(165)

·国民党报刊史料·

旧事溯源

- 在中央社北平分社工作片断赵孝章(170)
我和《奋斗日报》蒋曙晨(183)
《东南日报》的变迁穆远群(188)

·考证·补遗·

- 中国古代官报名实考姚福申(199)
《小孩月报》的姐妹刊《花图新报》葛伯熙(214)
《西瓜兄弟》的作者究竟是谁?王洪祥(218)
在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外文报纸陈 华(220)

早岁那知世事艰

——记在成都《华西晚报》的经历

黎澍

成都《华西晚报》是在1944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高涨中起过重要宣传鼓动作用的报纸。创刊于1941年4月，1947年6月1日被查封。《华西晚报》的兴衰，反映了中国民主运动从皖南事变以后的低潮上升到抗战胜利前后的高潮，再由高潮跌入低潮，终于发展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过程。我在《华西晚报》经历了民主运动由低潮到高涨起来的发展，在高潮中离开。现在回想那一段的工作和生活，虽然因为条件差，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满怀希望和信心，自觉地在完成一项历史性任务，这就是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痛恨国民党统治，下决心推翻它。为此目标奋斗，了无他念。所以当我要求一些旧友共同回忆往事的时候，大家都仿佛重新感受到了曾经充塞胸怀的战斗豪情，为我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补充和订正。

《华西晚报》景况

1943年11月间，我从桂林到重庆，与后来在上海办《文萃》周刊大显身手的吴承德同行。这个精明强干的青年，以强烈的事业心表示愿意参加我将担任的工作。到重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准备派我到成都《华西晚报》任主笔。晚报本

是消遣性质的读物，一般不以严肃的政论取胜。这《华西晚报》是个什么报纸，需要有人去担任主笔？我暗自感到奇怪。初步了解，这晚报是《华西日报》同人凑集少量资金办起来的，最初是个八开小报，参加的人有地下党员，多数是非党员。据说本来是想办一张“自己能作主”的非官方报纸。看来很可能是大家感觉《华西日报》是官报，说不定什么时候改组，先办一个同人报纸，预留地步，一旦有事，即可顺利转移。但是，他们虽然都是新闻界的活跃分子，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似乎并不敏感。报纸创刊之时，正当皖南事变以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全面反共。因此，报纸刚一问世，立即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全自己。大概为了这个原故，在1941年4月创刊到1943年的两年八个月时间里，报纸在政治上是灰色的，以社会新闻和某些趣味性作品取悦读者。我在重庆时只听说条件差，情况复杂，条件如何差，情况如何复杂，我想，这决非是在重庆所能了解清楚的。当时多少还有点年少气盛，颇以有打开局面和对付复杂环境的经验自诩，不怕人地生疏，一口接受下来。陆放翁诗“早岁那知世事艰”，遥想当年，情景颇相仿佛。倘若当时见识稍多一些，空想较少一些，大概不会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办这么一个报纸是可取的。因为在那样的恐怖统治下，报纸挺身而出，一定立即招来打击，查封了事。如果只顾保全自己，不起作用，那又何贵乎有此一报？可是当时见不及此，还是把它当作党的任务承担下来了。

我大概是在1943年12月初来到成都的。田一平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他的职务是《华西晚报》总经理。听他介绍情况，报社条件确实差。到里面看看，那就更差。编辑

部在一所名为“五世同堂”的破庙里办公，房屋阴暗潮湿，其简陋从所未见。报社没有自办的印刷设备。暗黄色的土纸，灰色的油墨，印出来的报纸实在很难说是悦目的。发行数量估计约二千份，广告收入几何，从未听人提起过。报纸本身不能自给，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当然跟着差了。现在人们常说当年在根据地过供给制生活如何艰苦，实际上，供给制生活不都是艰苦的，供给制包括衣食住行无所不供，有烟瘾的人还供烟。《华西晚报》工作人员待遇之菲薄，事后几乎很难想起是怎么过来的。我问过当时共事的好几位同志，回答大抵相同：每人每月三斗米（九十市斤），一千元。三斗米是伙食，一千元是个什么数目？黄是云说，约合现在人民币十元左右。田一平说：“开初可供一个月的喝茶钱”。“开初”是何年代？他没有明确说，总之是菲薄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唐振常补充说，他记得记者似另有车马费，其数目大概不能用以乘车马。当时成都亦无公共汽车，所谓车马，实际上还是两条腿。外出采访，不管多远都是跑路，只有车辐一人有一辆破自行车。这样就势必要另谋生计。本地人不消说，象我这样的外地人，后来也兼任了《华西日报》的副刊编辑。收入增加了一倍，或者更多，已经难以记得了。

我在成都感受到的最大的不快，就是所有这些条件都无法改善。一切都已经固定，谁也休想砸开一条缝来。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田一平外，还有总编辑李次平，加我共三人。田、李二人都是地下党员，同我没有组织联系。他们总算和我互相配合，控制了这个报纸。这种控制获得了几位主要编辑记者的支持，一项计划确定以后，从无二话，总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但是记者中有中统特务分子混迹

其间。所谓情况复杂，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种特务分子经人确证者至少有一人。此类人员的混入，大概同创办时争取合法地位有关系。既要得到官方承认，办理登记手续，就要以接受听他们使唤的人为条件。不过此等人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去报社无非起个官方耳目的作用，对报社工作不会有多大影响。

“五世同堂”盛事

《华西晚报》所在地址名为“五世同堂”，原为四川省立成都中学校址。门口高悬一块金字匾额，大书“五世同堂”四字。由于这个名称颇能给人以印象，所在街道也以“五世同堂”命名。这“五世同堂”看上去象一座年久失修的破庙。这“破庙”原是谁家的祠堂，或是因为五世同堂受过官府旌表的私人旧宅，没有任何人过问，甚至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人关心过。因为里面至少有三个机关，除了《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还有《中央日报》，主要建筑为它所占，这就使得人们兴趣索然了。

可是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破庙一度成为成都的文化中心。我到成都的时候，应云卫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和余克稷、张瑞芳领导的怒吼剧社正在这里演出。许多著名艺术家和演员聚集在这里。《华西晚报》负责接待，主其事者为报社记者王少燕。他把这所“破庙”里腾得出来的房间、大厅和角落全部腾出来，用苇席隔成小间供剧团人员住宿。记得初到成都不久，因事找郁风，发现她原来就住在这么一间用苇席隔成的棚子里。吴祖光和丁聪的居室又自成一格。院内有池，池上有小亭。他们用剧团布景片围作门墙，俨然成室，只是

夏日池中水汽蒸腾，热不可耐；冬天四面通风，冻得够呛。但生活诚然艰苦，倒也算得“五世同堂”这座“破庙”里的一时盛事。

《华西晚报》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左翼作家支持，使内容获得了很大的充实和改进。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邀请作家陈白尘担任副刊主编。这个改变使当时在成都和附近工作的作家，如叶圣陶、张天翼、陈翔鹤、叶丁易、荒芜(李乃仁)、贺孟斧、郁风、吴祖光、丁聪、邹荻帆、木将(耿振华)等人的名字经常在《华西晚报》出现。“五世同堂”对面的茶馆也成了作家和艺人们见面的场所。国民党统治极力排斥异己，“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大标语到处可见，茶馆酒店贴着“莫谈国事”的褪色的警告，可是完全白费力气，人们对这一类的标语和警告表现出异常的冷漠，似乎根本没有看见。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44年初开始在《华西晚报》工作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在报纸第一版左下角发表短评一则，名曰《灯下谈》。这《灯下谈》实际上是在上午八九点钟的朝阳下坐在茶馆里写的读报随笔。连续写了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你被注意了。报社记者何震川被指定专门监视你。他是中统特务。”何震川，我在同报社人员见面时已经认识了。其人五短身材，瘦瘦个子，能言善道，刺刺不休，水平低，为人庸俗，一望可知。他忠于监视我的职守。成都人有坐茶馆的习惯，特别是在晚饭后，不坐茶馆，仿佛一天的活动缺了点什么。为了增加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我开始入境随俗，每天晚饭过后，到营业部取一张当天的晚报去坐茶馆。何震川发现我的这样一个生活规律，果然不是先在营业部门口坐候，就是跟踪而来。我既已知道他是来执

行任务的，自然提高了警惕。后来有些朋友知道他来参加喝茶的目的，往往故意把他当作话题，使他一无所得而归。

成都对我究竟潜伏着多大的危险，我始终不清楚。只记得在开始工作不久，一天傍晚有人对我说：“你在成都能找到朋友家住一晚吗？有说今晚要动手捕人的，躲开一下为好。”真是难题。我第一次到成都，人地生疏，到哪里去找朋友家？实在没有。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回答说：“有。”当时恰好夏衍给我介绍一个在龙门书局工作的名叫汪震宇的青年来找过我几次，他原在新四军工作，在皖南事变中失散后来到四川，我去过他的宿舍，知道他在一座木板楼上有一个小小卧房。于是我就去找他，告以原委，在他的吱吱作响的木床上蜷伏了一夜。次日上午才得知这是一个知情人的警报，幸未成为事实。真正的麻烦是在同新闻检查官之间发生的。新闻检查是国民党借口战时紧急状态建立起来的。重庆设新闻检查处，属军事委员会，各地设战时新闻检查所。另外还设有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似乎又属市政府，亦无“战时”字样，与新闻检查所不是一个系统，但二者有一点相同，即都以控制思想言论自由为任务。它们是报纸、通讯社和图书杂志出版社的统治者，通知送审稿件常用命令语气。我非常不乐意接受这种命令，连看一眼的愿望都没有，并且极力避免同这些自以为掌握了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官员们见面。凡事由报社总经理田一平出面应付。因此检查官和报社的联系有点近似聋子对话，经常答非所问。这也是我意想中的最佳效果。送审的稿子大都是不准备发表的，发表的稿子都是临时赶写，来不及送审的。检查官对此非常生气。他们训斥田一平。田一平不免支吾一番，仿佛承担了责

任，但是不能负责切实改正，因为这在报社内部又是难以通得过的。按照一般情况，同检查官关系如此之不协调，是要招祸的。居然能如此这般敷衍下来，多少是由于成都为地方势力所在，起了缓冲作用。四川地方势力的这种作用很微妙，它似乎是不可忽视的，可又并不是真正过硬的。《华西晚报》和《华西日报》仿佛一家，而后者明确是以四川军人潘文华为背景的。在一般人印象中，《华西晚报》也受其庇护。倘若真求他的庇护，大概也就是打个圆场罢了。《华西晚报》能在一个时期内为世所瞩目，主要还是因为它敢于站在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前列，为人民说话，代表了广大群众的要求，成了有群众基础的报纸。一旦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报纸赖以存在的条件随之消失，反动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它扼死。后来的发展正是这样。

经过多人的反复回忆，大概有三个事件使人们对《华西晚报》有印象：第一是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新高涨，第二是因此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寻衅捣毁，第三是发起自动废除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1944年秋，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高涨起来。这次高潮是民主人士和广大青年学生对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以后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抗议。为什么这次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在此时爆发，而不是更早些呢？以我个人的直接感受而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

第一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镇压导致了特务横行，侵夺了一般人的民主权利，特别是使民主人士和

青年群众蒙受的压抑和耻辱，已经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

第二是国民党军在1944年5月开始的湘桂战争中望风逃窜，毫无抵抗日军进攻的斗志。当时还传说重庆国民党政府有放弃西南，迁都青海省玉树县的计划，闻者无不痛愤。

中共中央及时注意到了群众中的这种情绪。毛泽东在3月13日接见中外记者团时发表谈话说：“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到胜利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共产党希望于国民党的也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这话无疑起了号召作用。一个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就在这年秋天发展起来了。

这次运动从成都开始，成都市中学生反对军训又是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成都市中是成都市立中学的简称。这市立中学又分男中女中两部，相距很近。女中是新成立的，标榜认真读书，不问政治。但国民党当局规定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其中有受军事训练的规定。学生反对军训，相持十日，校长无法强制学生上操，求助于市长余中英。11月10日，余中英派警察局长方超亲率警察数百名前往镇压，勒令上操。学生四散逃窜，警察到处搜查，甚至追到宿舍，把带病的学生从床上抓起来。双方发生斗殴，附近男中学生赶来支援。一场混战，男女学生被打伤三十余人，四十多人被捕。警察的暴行引起全市大中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11月11日爆发万余学生的大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暴行，并派代表向省政府主席张群提出四项要求：一、公布事件真相；二、严罚余中英、方超；三、负责医治受伤同学，释放被捕同学，保障学生人身自由；四、立即停止党化教育。张群不敢与学生群众见面，派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和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接见学生代表，表示接受四项要求中的前三项，企图平息学

潮，他自己抽身跑到地方派邓锡侯家里，邀刘文辉、潘文华共同研究对付办法，企图把责任推给他们。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故意制造混乱，派人假冒学生在一些地方张贴别有用心的标语，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推翻国民党政府”等等，为血腥镇压制造口实。其实当时四川地下党遵守隐蔽原则，事发时并未从中起作用，事发以后，才由四川大学教授李相符以民主人士身份出面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把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形成外围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华西晚报》是公开出版的报纸，职司报道，对事件不能没有是非。它在举世诤诤的状态中表明了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市中校长是青年党成员。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仅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发了条简短的新闻，为的是便于校方向受害学生和家长交代责任。《华西晚报》从11月1日到11日即学生上街游行之日，每天都有几篇关于学生活动的报道，11日还以《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为题发表社论，与学生游行队伍的口号互相呼应，说明这确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华西晚报》代表了舆论，因此受到了欢迎，也受到了攻击。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在学生游行示威的当天晚上打电话警告田一平说，“老头子”（蒋介石）已经两次来电话查问《华西晚报》鼓动学生闹事的背景了。情况紧张，可以想见。当时在成都几所著名大学——四川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都可以看到学生们把《华西晚报》张贴在校门口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用红笔加上圈点，以唤起路人的注意。群众情绪之热烈，为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所仅见。

在1944年秋湘桂战争急剧发展中撤退到成都的《广西日

报》记者陈子涛和国新社记者唐海（当时是衡阳《大刚报》驻桂林记者），立即应邀参加了《华西晚报》工作，投身正在高涨中的民主运动。1945年夏，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唐振常，本已选定到重庆《大公报》实习新闻业务，因为他这一时期以来是《华西晚报》的投稿者，同我熟识，听了我的建议，决定改在《华西晚报》这样一个条件远不如重庆《大公报》的报社实习，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活。实习期满，一面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一面仍旧留在《华西晚报》正式工作。陈子涛和唐海早已是新闻界的活跃分子。唐振常后来在上海与唐海同为当时国内著名记者。这些人参加工作，大大加强了《华西晚报》阵容，与原在报社工作的进步记者黄是云、车辐相配合，控制了整个新闻版面。到这时候，《华西晚报》可说完成了一次改组，所有同中统有联系的人完全失去作用。

由于事态扩大，头绪纷繁，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张友渔从重庆来到了成都。他对当地群众运动的高涨，感到兴奋。他的到来，加强了省委同各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协助了四川省民主同盟的建立。那时有不少进步青年被吸收进了民主同盟，后来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成了积极的力量。

四川省民主同盟的成立，还为《华西晚报》提供了一个后台。《华西晚报》是个没有任何可靠后台的报纸，一旦有事，不会有任何人站出来替他提供保护伞。四川省民盟成立以后，接着就宣布《华西晚报》为机关报，民盟主席张澜任董事长。这个后台不硬，但总算有了个公开的名义。

反动派的寻衅

1944年11月11日成都大中學生上街游行示威事件，是后方各地學生运动的先声，此后主要斗争场所转移到了大学。从重庆《新华日报》的有关报道看来，反对军训经常是引起罢课的主题。事件此落彼起，一直延续到1945年上学期。每次事件一经爆发，锋芒立即转向争民主、反独裁。《华西晚报》关于这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最多。反动派对此感到头痛，但在事件一触即发之际，也不敢滥用权力，以免引起各界人士反对，把问题闹大，那样民主运动就会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后来大概感到实在难以容忍，终于采取下策，用非法手段进行破坏，指使三青团学生上门进行打砸抢。综合《华西晚报》的记载，事实经过如下：

1945年4月18日夜间9时许，有暴徒约五十余人，自称川大学生，来到《华西晚报》营业部闹了一场。其实晚报至迟下午一二时出版，工作早已完毕。营业部除了留下个把人看守帐簿和少量现款，也不会有多少可以打砸的东西。暴徒们在这里打砸完毕以后，又蜂拥到五世同堂编辑部。其时晚报无人工作，《华西日报》夜班工作人员也还没有上班，倒是驻在附近的军警联合行动组组长魏建中（川军彭光汉部团长）闻讯率队赶到，责以深夜侵扰报馆，威胁记者，扰乱治安，拘捕未及退走的学生二十八人。这天晚上算是没有达到打砸的目的，还被抓了人。次日（19日）上午10时许，又有自称四川大学夜校及升学预备班学生约三百人，先到营业部闹了一场，然后又闹到了编辑部，扬言“不论晚报日报的编辑我们都要会”、“打烂再说”等等。两报人员纷纷走避，只有

编辑陈子涛自动要求留下，以便同这些不速之客进行辩论。没有想到来人声势汹汹，不可理喻，一言不合，就动起武来，陈子涛挨了一顿打。《华西晚报》是个穷报馆，其他可打的人都跑了，里面可砸的东西实在不多，于是大砸《华西日报》，拆断电话，捣毁该报印厂全部字架，殴伤工人一人，闹了约两小时，至12时半散去。

凡事都是闹大的，没有人闹，大概都很平常。《华西晚报》经过这么一闹，反而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4月28日第三版发表一则成都通讯，足以说明问题。录存如下：

（成都通讯）《华西晚报》自本月18、19两次被自称‘学生’的暴徒捣毁机房，殴伤编辑后，曾发表紧急启事，呼吁言论自由及保障人权，并声明暂行停刊，同时《华西日报》也因印刷厂被波及无法出版而停刊。这件事发生以后，各界都很愤慨，连日以来，纷赴两报社慰问，除了同业及文协成都分会，四川全省各县旅省同乡会，教育界、医师、银行界都派代表慰问以外，还有中大、川大几百学生亲往慰问。21日更有川大壁报联合会等十五团体、燕大学生十九团体联名慰问。下午成都报业公会召开会员大会，一致表示声援。两报同人得到了这许多的同情和声援之后，深为感动，决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到底，再接再厉。《华西晚报》已在21日晚上复刊，《华西日报》也在22日晨继续出版了。

该报末附《编者按》说：“关于《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被‘学生’捣毁事，我们曾有过消息，但没有能够登出来。”

当时环境和情况大致类此。

争取民主权利的高潮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可以算得是《华西晚报》最有声色